

我看資本主義下的美國

• 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喬姆斯基曾被稱為美國最偉大的異議份子(dissenter)，而他的著作則被目為美國歷史上最令人不安(unsettling)的。他率直、憤激的意見自然帶有強烈爭議性，但他不中聽的說話，恐怕還是值得和需要傾聽的。因此，我們很高興，本刊在去年年底徵得他同意，以電傳方式向他提出一系列書面問題(▲)，並隨即蒙他迅速詳細作答(□)，經翻譯和整理，成為以下的筆訪錄。對喬姆斯基教授的支持和合作，我們謹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編輯室

▲ 你在早年有過一些不凡經驗，這對你現在的重要事業(如果這是適當字眼)也許有裨益。你是否同意，主要是十分自由開放的教育經驗(比如就讀進步學校和獲任哈佛初級研究員)和反越戰示威所帶來的衝擊這兩者的結合，把你引導到現在的方向？你是否同意越戰是激起美國人良知的轉捩點？

□ 我早年(約從兩歲到十二歲)就讀奉行杜威主義教育思想、推行進步教育法的實驗學校的經驗，也許對我思考事物的方式(包括社會和政治世界)不無影響。然而，就我所知，這對於其他學生卻沒有相同的效果。另一個因素無疑就是經濟大蕭條。在我最早的童年記憶裏，有人上門兜售破衣糊口，以及警察襲擊製衣廠女工的情境。我有許多當工人的猶太親戚，那時他們多半失業，因而投身到工人鬥爭行列，有的參加共產黨，有的加入其他左派組織。有一位叔父對我的影響特別深，他小學時已輟學，完全靠自學成功，並且是我認識的人之中，最有學問、最有教養而又最圓融通達的一位。他經歷過所有想得出的激進派系，最終成為一位反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思主義左派份子。我認識過好幾個有

當我約十二歲，年紀大得可以自己乘火車去紐約的時候，便定期到那兒，終日流連無政府主義者事務處、老激進份子經營的舊書店和其他類似的

相類看法的人，並立刻被他們吸引。但再一次，我不知道為甚麼其他人後來和我並不一樣。

我家在費城，距離紐約大概有九十哩路。當我約十二歲，年紀大得可以自己乘火車去紐約的時候，便定期到那兒，住在親戚家，終日流連無政府主義者事務處、老激進份子經營的舊書店和其他類似的地方。1930年代後期，我密切注視西班牙內戰，沒多久，就清楚看到共產黨、法西斯和西方民主實際上勾結起來的時候對左翼和工農運動所造成的破壞了。我對這些運動的背景是後來才知道得更多的。那是偉大的思潮激盪的年代，也是團結的、社會變革的和希望的年代，但有些事情現在已記不起來了。

對我來說，獲任哈佛的初級研究員(Junior Fellow)實在大喜過望(譯者註：1951-55年)，因為這使我可以利用這所頂尖大學的資源，同時我第一次可以不用靠賺外快過活。但這對我的世界觀的衝擊，卻又大大加深了我原來對精英知識文化的深惡痛絕——我厭惡它的僵化、它的教條本質、它的侵略性和對獨立思考的強烈排斥。在我看來，這種精英文化骨子裏是極之專制的，雖然它往往被冠以「自由」之名。

二次大戰後，曾經有過一場大規模的意識形態運動，企圖把經過1930年代和戰爭時期的思潮和社會沸騰，恢復到原來的有序和馴服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也出現過同樣事情，威爾遜政府聯合了商界和新聞界力量，發動一場運動，成功摧毀了勞工運動和獨立政見與思想，重新建立原來由商界主宰的局面。這蟄伏狀態直到大蕭條再度點燃被抑壓的火燄才終止。二次大戰後歷史重演，由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再一次領頭。50年代和20年代十分相似：百姓被動、順從、噤若寒蟬，精英根據所謂主流「民主」理想，逕自統治國家：百姓是「無知和好管閒事的局外人」，他們只能做「旁觀者」而非「參與者」，公共事務要由「負責的人」管理，這些人是靠着向商業—國家結合體俯首帖耳而獲得「負責」位置的。這些事是說不得的，而且就是那些自以為有這地位的人，也不見得真正明白。上述字眼，是從備受尊崇的美國學者和政治評論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討論民主的「先進」著述中引用的，但它們的確反映了許多對於「民主」本質的看法。它們之和馬列主義相類似，是明顯又易懂的，這和人之為了趨名附利而輕易改變觀點其實並無二致。

越戰和其前的民權運動粉碎了美國的自滿和冷漠，就像30年代的大蕭條一樣。但必須注意：這兩次民眾運動的本質和它被塑造的教條式歷史形象大不相同，那種形象必然導致70年代初期一個更新、更激烈的運動，以求消滅民主禍患(自由主義精英稱之為「民主危機」)，把民眾帶回冷漠和順從——根據統治教條這也就是他們的恰當態度。

▲ 自十六世紀起，西方即進行全球擴張，而這種擴張大多藉着清晰明確的名堂——例如傳教、殖民主義、國家利益等，赤裸裸地以武力方式進行。所以在往昔的黃金歲月(比方二十世紀中葉以前)，沒有甚麼需要隱瞞，也不必對媒

在今天，殖民主義擴張無疑是以更隱蔽的方式進行。有趣的是，體面知識份子編出掩飾事實的奇妙故事，和以往仍然如出一轍，例如基辛格和亨廷頓的滑稽可笑行徑，就是我經常引用和討論的。

體進行微妙的控制。是否可以說，在美國，對媒體的控制越來越微妙和「無形」，是由於時代轉變，新的擴張形式(商業宰制是最終目的)再不能公開和直接地在公眾之間討論？換言之，為了維持國際秩序穩定，西方的全球擴張現在必須以秘密方式進行了。

□ 在今天，殖民主義擴張無疑是以更隱蔽的方式進行，有趣的是，體面知識份子編出掩飾事實的奇妙故事，和以往仍然如出一轍，所以我們聽到有關「利他主義」、「理想主義」、「仁愛」、「文化的使命」、「獻身於人權和民主」的說法，和幾百年前並無二致。有些當代狂熱份子甚至比前人更加偏激，例如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和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滑稽可笑行徑，就是我經常引用和討論的。應該補充，我並不認為這是有意欺騙：西方知識份子可能當真相信自己的說話，正如斯大林主義知識份子一樣。

▲ 照你估計，美國的媒體和宣傳系統在延長剛剛結束的冷戰方面，扮演了甚麼樣的角色？美國媒體失去了冷戰這一基本架構，將會發展出怎麼樣的新架構來替代？

□ 國家—企業宣傳體系在冷戰時期肯定擔當主要角色，而媒體自然是這個體系的核心。但是，除了抑制民眾，不讓他們了解實際情況之外，我很懷疑它們是否「延長」冷戰。冷戰是一場真正的衝突。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東歐就是當時的「第三世界」。歐洲征服世界的基本原則是，南方必須接受僕役地位，為「人類主宰」提供資源、廉價勞工、市場、投資機會和其他享受，這是美國在1945年繼承歐洲地位之後所曾清楚地加以發揮的。「人類主宰」奉行的卑劣格言就是：「一切為我，絕不為人」(我引用亞當·斯密的話，他是最能洞察這過程，也最為當代理論家歪曲的作家之一)。比起獨立這一罪行更糟的是，成功可能啟發其他受壓迫者。在這情況下，干犯獨立罪行的人便成為「傳染病」(凱南 Geroge Kennan)、會「殃及整桶」的「爛蘋果」(艾奇遜 Dean G. Acheson)、會「感染別人」的「病毒」(基辛格)。獨立必須消滅，傳染病更當如此。

列寧—托洛斯基的1917政變迅速消滅了所有在政變前出現的社會主義和民主趨勢，俄國繼而走向獨立，這是不能容忍的。更糟的是，它似乎在工業化和發展方面都取得成功，這是直至1960年代為止英美領袖都清楚了解，而且為了上述原因感到十分恐懼的。中國的極權發展之被視為重大威脅亦是基於完全相同的原因：它的成功可能有啟發性，因此，這病毒非消滅不可。基本上，同一邏輯支使卡特和後來的里根政府出兵推翻膽敢設立幾個漁業合作社的格林納達和其他類似政府。推翻格林納達只用了一個周末，推翻蘇聯則花了七十年。由於規模不同，顛覆方式亦顯著不同，但基本邏輯並無二致。因此，客觀政論家對大部分東歐國家在冷戰後退回到第三世界地位不會感到驚訝，這對大多數東歐民眾是災難，但對於多數是前共產黨員的精英，卻最好不過。他們現在為西

客觀政論家對大部分東歐國家在冷戰後退回到第三世界地位不會感到驚訝，這對大多數東歐民眾是災難，但對於多數是前共產黨員的精英，卻最好不過。他們現在為西方主人工作，獲得夢想不到的財富，他們是冷戰的真正贏家。

方主人工作，獲得夢想不到的財富，他們是冷戰的真正贏家。

體面知識份子和媒體的責任就是隱瞞所有這些基本事實，隱瞞五角大廈以補貼整個高科技工業的方式，來強迫人民提供福利給有錢人。正如首任空軍部長賽明頓(Stuart Symington)所說：向無知大眾說話時，應該用「安全」而不是「補助」那樣的字眼。冷戰提供了對抗形象，知識份子則一如既往盡了本份。現在，他們得加倍努力去解釋為甚麼冷戰結束後，國防預算仍然居高不下，而且逐年增加。但對訓練有素和知識過人的階層來說，這不是甚麼難事。

在美國這樣的「自由社會」，實際上100%人口，只能透過狹窄和受嚴格管制的教條式機構獲得資訊。這種情況很自然，當能夠以武力來控制人民時，他們信甚麼並不太重要。

▲ 西方國家堅持資訊應該跨越國界自由流動的原則，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視西方企業或政府之宰制媒體，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很多人相信像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這類機構，為極權統治下受壓迫的知識份子提供了通向外部世界的重要窗口。有些人更認為，雖然西方媒體會傳播與他們國家利益或本國文化衝突的價值觀，但沒有這些媒體，他們的境況會更糟。你對這些不同論據有甚麼看法？

□ 西方國家其實是強烈反對資訊在國內或跨國自由流動的。她們實在比極權國家更注意箝制獨立思想，理由很充分：假如能用暴力控制人民，那他們怎麼想關係不大：假如他們獲得了一些自由，控制思想和觀點就變得重要了。這一點大家耳熟能詳，很容易引證，也相當重要。

對生活在斯大林式政權和其他極權統治下的人民來說，外界聲音無疑很重要。美國政府和學術界發現：77%藍領工人和96%中產精英在勃涅日列夫的俄國收聽外國廣播，而45%高級專業人士、41%政治領袖、27%管理人員和14%藍領工人則從其他渠道(地下印刷品)獲取資訊。至於在美國這樣的「自由社會」，實際上100%人口，包括受過高深教育的一群，卻只能透過狹窄和受嚴格管制的教條式機構獲得資訊：由於資源極度集中，只有極少數人能獲得類似蘇聯的地下出版刊物。這種情況很自然，當能夠以武力來控制人民時，他們信甚麼並不太重要。

幾年前，第三世界試圖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來打破西方媒體的壟斷。那次嘗試激起了歇斯底理的反應，原因很明顯：封殺獨立聲音是頭等大事。

▲ 你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應該(或能夠)如何抗衡法力無邊的西方媒體？媒體怎樣才能真正為促進各國人民的了解盡力？還是這只是一種幻想？

□ 幾年前，第三世界試圖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來打破西方媒體的壟斷。那次嘗試激起了歇斯底理的反應，一連串連令斯大林也要為之拜服的謊言和欺騙，以及一次成功地剿滅了膽敢幹此等勾當的犯罪集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聖戰。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希望與荒唐》(*Hope and Folly*)詳細記述了這一驚人故事。當然，馴服和有紀律的知識份子不可能也沒有評論或提及這本書。謊話沒有被揭破，還是繼續說下去。這歇斯底理反應的原因很明顯：封殺獨立聲音是頭等大事。

▲ 隨着新傳訊科技的出現，特別是電子郵件的應用和通過電腦網絡來交換意見與獲得資訊，它們作為人類解放而非控制和支配工具的前景如何？

□ 這端看誰操縱它。收音機和電視出現的時候，也有同樣問題，答案不一而足。在美國，不像其他社會，電台和電視台大多數是操縱在企業手裏，因此，自然變成他們的私人力量，用來達到他們明顯不過的目的。除非大眾力量組織起來控制它們，否則新通訊科技的前景多半也是一樣。這照目前情況看來，機會十分渺茫。

▲ 克林頓總統接受了國會設立自由中國廣播電台(Radio Free China)的決議。這個電台開宗明義是要為中國人民提供資訊和在中國促進自由思想和人權。雖然這可能是一個雙重標準的政策，但你認為美國政府這種作法有好處嗎？

□ 克林頓和他的前任以及政治對手一樣，對自由思想抱蔑視態度。幾百年來，標準教條一直是有錢人和特權份子須由政府保護，使免受市場規律衝擊，窮人和弱者則必須接受這規律，以使他們能夠被有效地控制和剝削。所有這些都是(或應是)老生常談了。要證明這點再也容易不過，對認真的經濟歷史學家來說，它只是常識而已。然而，可不能讓普羅大眾明白這一點，無論是在美國抑或海外。

人權正是同一碼事。如果喊「人權」可作為攫取權力和特權的工具，那麼克林頓(一如他的前任和對手)就是熱心的人權支持者。如果否定人權有同樣效果，我們就會發現促進人權的最佳方法是賣克雷(Cray)超級電腦、波音飛機、通用電力的核子發電機、休斯公司的人造衛星等等給中國(純粹碰巧，這些都有利於美國公司)。知識階層中，也只有訓練得最好的才能上演這等鬧劇。他們要掩飾美援和酷刑之間經常存在的密切關係：在西半球違犯人權最嚴重的國家(哥倫比亞)獲得超過一半美國軍事援助(克林頓掌政後這繼續在增加)這一事實：還有過去五位總統任內，美國一直帶頭支持印尼肆虐東帝汶(那是現代最接近滅種罪的暴行)這一事實：還有其他許多不方便說出來的事情。要當一個體面的知識份子可還真不容易。

對「自由市場」和「人權」的死敵所散播的有關這些理念的明顯謊言，世界各地人民都應該直接了當地揭破它。

▲ 儘管媒體有其限制、缺點和偏頗，你是否同意這些年來，它對美國人的服務比世界其他地方都好？你說在美國只有一個分成兩派的政黨，然而自由主義在60年代佔上風，如今保守主義高漲。媒體對這國民情緒的歷史變遷有甚麼影響？

保守主義如果是指致力締造一個大肆干預內部經濟，國家奉行極權教條，要盡可能規避公眾監督，認為人民甚至連當「旁觀者」的權利也沒有，那麼說今天「保守主義」高漲，的確不錯。

□ 美國媒體壞不過其他的，也許比大部分還要好。如果來一次比較研究的話（這種研究至今還未做過），也許會顯明它是世界最好的，但那卻並不是甚麼恭維。但美國之外很少對媒體進行評核性分析，因為各地知識份子普遍更為傾向服從權力。所以，很難有結論。

「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差異不大，也不前後一致。所謂「保守主義」，如果是指致力締造一個大肆干預內部經濟，把保護主義提昇至戰後高峰（這是里根政府向商界演說時津津樂道的成就）的福利國家（對有錢人來說），而且，這國家奉行極權教條，要盡可能規避公眾監督，認為人民甚至連當「旁觀者」的權利也沒有，等等，那麼說今天「保守主義」高漲，的確不錯。「保守主義」首要倡議者金里奇(Newt Gingrich)代表亞特蘭大一個郊區，亞特蘭大非常富庶，因為除了州系統以外，它所獲得的聯邦補助比全國其他市郊縣都要多（事實上，它排名第三，僅次於維珍尼亞州的亞靈頓，那實際上是華盛頓特區一部分，和佛羅里達肯尼迪太空中心的所在地，那是把公款輸入高科技工業的漏斗），這就是當代「保守主義」本質的寫照。一面愉快地靠公款過活，一面指斥「保姆政府」，肯定是很有趣的。在競選時民主黨只要揭穿這點就應該立刻可以壓下金里奇的聲勢，耐人尋味的是他們卻不這樣做。原因大概是他們對金里奇為富人建立強大福利國家的承諾有同感，也同意整件事情必須瞞着人民吧。

媒體當然是在本質上反民主的。它們畢竟是大企業，是更龐大集團的一部分。它們把產品（觀眾）賣給市場（其他商業）。在這樣的體制內，媒體除了反民主之外，還可以是甚麼？

▲ 以你對美國傳媒和權力結構的批評來看，你似乎認同帶有民粹主義傾向的傑佛遜民主觀念。這說法對嗎？若是如此，你認為傑佛遜式民主理念中「開明民眾」的理想，真能在像美國那麼都市化、工業化和幅員龐大的國家實現嗎？在政治過程中，媒體不是總有把可能參與者轉化為旁觀者的傾向的嗎？換而言之，受資本主義邏輯宰制的大型媒體是否在本質上就反民主？

□ 自傑佛遜時代以降，一如他所憂慮的，民主在很多方面都倒退了。要記得傑佛遜極力反對現代大企業的興起，他認為它們是不須負責的機構，因而會促成一種新的專制主義。這正就是當法庭和律師（而並非立法）賦予它們特別權利和權力時所出現的情況。當私人權力伸展到國際經濟和社會時，這種新極權主義遠遠超越了傑佛遜最壞惡夢的預見。我認為在啟蒙理念受到攻擊，不法、不負責任的力量和權威取得巨大勝利的時候，更應該保衛（或更準確地說，應該復興）啟蒙理念。

媒體當然是在本質上反民主的。它們畢竟是大企業，是更龐大集團的一部分。它們把產品（觀眾）賣給市場（其他商業）。要成為它們一份子，就必須證明自己已充分接受了權力和支配系統的價值觀。這主要是通過精英大學教育的篩選和通常灌輸作用。在這樣的體制內，媒體除了反民主之外，還可以是甚麼？

當然，這模式不是沒有例外。專業操守還未曾完全被壓制掉，偶然還會和權力對抗。在整體模式的邊緣總還有偏差，正如在邊緣私人權力也不總是追求市場和利潤。但這制度的基本形態是明顯不過的了。

▲ 你認為企業利益是美國外交政策和作業的決定因素，也是控制媒體的最終力量。然而，大型跨國企業無視國界，把全球整合視為它們的目標。那麼你覺得這美國現象（即是政治和媒體被寡頭壟斷的企業利益支配）會否成為全球特點，即是有歐洲、日本甚或中國企業集團積極參與？若這種情況真的出現，那麼企業宰制是否會喪失國界特質而成為社會結構的普遍問題？

□ 跨國企業與國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正如亞當·斯密在幾百年前主要還是國民經濟的時代指出，「政策的總建築師」追求增進利潤，罔顧別人（包括他們的國民）可能受到的傷害。當跨國企業在世界經濟和社會中獲得支配性地位之時，亞當·斯密的老道理越見明顯。但是這些機構亦有賴強有力的政府去確保世界紀律和維護它們。無論意識形態把戲怎樣玩，企業領袖都明白如果沒有大力保護和公共補貼，他們是不能生存的。這在美國從頭就是如此，在里根年代更是變本加厲。自然，跨國企業和政府權力關係很曖昧，他們之間有時候會產生問題和衝突。

美國、歐洲、日本、其他第一世界社會、俄羅斯、東歐、中國、印度乃至一般的第三世界頭領們，是有共同利益的。其中之一是確保貧窮的多數受制於市場規律，而他們自己則受強政府保護，超脫於市場之外。此外是把尋常百姓蒙在鼓裏，不讓他們明白自己的處境。當然，這些集團在社會之內和不同社會之間有利益衝突。例如，在今天，美國國內頭領間就有衝突：全國製造業公會希望聯邦儲備銀行放寬經濟增長，但達到天文數字的金融資本，卻要遏止經濟增長和壓抑通貨膨脹。衝突每天上演，有些是跨越國界的。只看基本形態，主導制度是夠簡單的，但當進一步看細節的話，許多複雜情形就浮現了。這和我們研究自然界時發現的情形是一樣的。

無論意識形態把戲怎樣玩，企業領袖都明白如果沒有大力保護和公共補貼，他們是不能生存的。這在美國從頭就是如此，在里根年代更是變本加厲。

▲ 媒體控制這樣無孔不入，這樣深入大眾（包括知識份子和評論家）意識，它是不是已成為一種深層文化？換言之，美國大眾是否真想知道真相和傾聽他們拉丁美洲鄰國所受的蹂躪？畢竟，至少在短期內，這可能是對他們有利的。事實上，許多美國學者似乎實在是了解（縱然只是隱約地）正在發生甚麼事，但卻束手無策。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 大眾當然想知道真相。就如民意調查清楚顯示，美國民眾是氣憤、懷疑和害怕的。他們知道自己正被欺騙和壓制，而且憤怒非常。對於那些體面知識份子和他們的主子來說，認為民眾不想知道真相自然更省事。但事實卻正好相反。就像勃列日涅夫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人一樣，美國人也很想知道真相，但「政委」另有說法，兩方面都是一樣。

▲ 你對語言結構的研究和對美國媒體的批評是否有認知上的關係？過去幾年來，主要憑着著書和演講，你單槍匹馬和媒體打了一場很漂亮的仗。但到目

前為止，在喚醒美國人方面看來你仍然有待獲得突破。你滿足於只當美國人的良知，只是曠野中的聲音嗎，抑或你想過用更有效的方法來宣揚自己的看法？

□ 幾乎沒有。目前只有很少學術領域是有真正思想深度的，而這些領域對人文現象卻沒有多大關係。為了切身利益，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自然要否認這個事實，但僅僅為了其利害攸關，這否認就值得懷疑了。依我看，他們的說法是沒有甚麼價值的。

我不認為我是「曠野中的聲音」。當然，我不期望被精英意見容忍，若是那樣，我就要認為有甚麼地方做錯了。我要做的，是喚起那些不相信權威的絕大多數群眾。

我不認為我是「曠野中的聲音」。當然，我不期望被精英意見容忍，若是那樣，我就要認為有甚麼地方做錯了。我要做的，是喚起那些不相信權威的絕大多數群眾。自然，一個人的呼聲有限。但當民眾組織出現，人民聯合起來了解世界，爭取共同利益的時候，那些選擇加入他們行列的人是可以學習也可以發揮作用的。我自己別無他求，我對過去這些年來的種種進展已經十分滿意了。

1994年12月14日

林立偉 譯

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28年生於美國費城，16歲入賓夕凡尼亞大學，由於受哈里斯(Zellig Harris)影響，專攻語言學及哲學，分別在1949年及1951年獲學士及碩士學位。1954年曾赴以色列在一集體農莊(Kibbutz)體驗生活六個星期之久。1955年獲賓夕凡尼亞大學頒博士學位，隨即受聘於麻省理工學院為研究人員，其後四十年間即任教於該校語言學及哲學系，1976年榮升為Institute Professor。

有關喬姆斯基在語言學方面的創時代貢獻，可參閱紐邁耶教授為本欄所作的「側寫」(第24頁)，至於他的經歷和政治思想發展過程，則除了本篇筆訪錄之外，詳見 James Peck, ed.: *The Chomsky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1987) 一書的「導言」和「訪問錄」(pp. vii-xix, 3-55)。喬姆斯基的重要政治評論著作尚有：*Chronicles of Dissent: Interviews with David Barsamian* (Stirling, Scotland: AK Press, 1992);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Concord, Ontario: Anansi Press, 1991);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1988)，以及 *Problems of Knowledge and Freedom,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 等多種專書。